中国企业跨国互动策略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基于对某中坦农场的工商人类学考察

王伊欢　雷　雯

[摘要]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源于西方，单纯使用这个概念考察中国在海外企业的承担实践，容易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尤其是在全球化跨文化背景中，容易忽略不同主体围绕此概念所进行的互动过程及其建构概念的能动性。本文应用工商人类学研究方法，以“挪用”为分析框架，对坦桑尼亚某中资农场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进行研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西方话语概念，在跨文化背景下被不同主体及情景所形塑的具体过程，并揭示中非遭遇过程中隐含的西方在场，展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特殊挑战。

[关键词] 跨国企业; 国有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在非洲; 挪用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7)05—0008—07

基金项目: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支持的“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项目(中国农业大学立项，29034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伊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3

一、成为“议题”的企业社会责任

近期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下，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得以进一步深化，“走出去”的规模及广度进一步增强，据最新披露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规模就达到了1231.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并首次接近利用外资的“引进来”流量规模，“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蓬勃发展的中国对外投资现状一方面显现了我国引领下的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同时也将我国对外合作，尤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投资，置于西方媒体舆论的风暴眼中。我国企业在海外不但面临着复杂的跨国经营环境，且稍有不慎还会被贴上“资源掠夺、新殖民主义”等污名化标签[1][2][3]。为此，我国相关部门以构建服务“走出去”战略的新机制，针对企业的在地经营与文化构建，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件指导、鼓励并倡导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承担，推进走出去的企业形象打造、实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①。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西方原生的地方性概念，在向全球化理念转变的过程中，是同国际发展机构对“发展、善治”等话语的制造紧密相联的[4][5][6]。Pegg在针对中国石油企业在非投资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通常被认为是“底层掠食者”(Bottom Feeder)，而西方则被形塑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最佳的“全球表率”(World Leader)，但实际上西方企业做得有多好，中国企业做得有多差都是存疑的[7](P.262-263)。反观我国已有的海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要研究思路还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固态化、应然化，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寻求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治愈”海外企业承担不足，寻求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治理方案[8][9][10]。笔者认为，简单地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套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研究，不但会忽略了概念背后的话语建构过程，落入到西方价值为表征的“话语陷阱”当中，而且会遮蔽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该概念的不同理解，及跨文化语境下不同能动者对这一概念的形塑力。因此，如何跳脱企业社会责任所隐含的话语陷阱，在跨文化背景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及现实状态进行再考，是本文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

针对这一研究问题，笔者选取工商人类学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切入。人类学的工商研究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11]，在80年代后，受惠于人类学应用传统[12][13]与管理学的文化转向的双重推动，工商人类学(Business Anthropology)重新兴起。目前为止，工商人类学的关注领域涉及组织人类学、市场和消费人类学、设计人类学[14]及竞争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情报和知识管理、国际商务及跨文化商业交流[15](P.26-27),而其中贯穿的主线是对全球化及多样性的话题的探讨[14]。近期中国的工商人类学发展迅速,不但产生了基于国内企业的个案深描[16],而且还对跨文化跨民族背景下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跨国企业的文化差异及其管理、跨民族营销[17]等。作为研究方法的工商人类学具有"文化之眼"[11],致力于在工商与管理中发现文化,这种对于全球化及多样化议题的关注与本研究中关注的跨文化背景相符;同时工商人类学所包含的参与式观察、现象学方法、关键事件法、扎根理论及民族志撰写[18]等具体质性方法也已经被证明恰适于跨文化背景下的企业互动研究。

应用工商人类学研究方法,两位作者在2012年—2016年期间,前后多次前往坦桑尼亚,针对个案农场及其周边村落完成了近6个月的田野调查。基于田野调查材料,本文将针对某中国国企在海外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以"挪用"这个互动策略为分析框架,对不同行动者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以呈现出作为策略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非遭遇互动过程中的动态发展。

二、"挪用":一个互动策略的分析框架

汉语语境下"挪"是指移动,而"用"是指使人或者物发挥功能②,据《汉语知识词典》解释,挪用有两方面含义:把某方面的钱用到别的方面;把本不用于某场合的词、语、句临时挪来使用。而现实语境中多取其经济含义,与"挪用资金"相关联,构成一种负面含义的评价。在英语语境中,挪用(Appropriate)其词根源于拉丁语"*ad*"与"*proprius/proper*"的组合,而*proprius*为属于个人的财产之意③。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指出挪用(Appropriate)隐含着借用、窃取的含义,并且挑战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的观念[19](P.107),同时大众文化经常以挪用作为攻击和抵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20](P.12)。以"文化挪用"为核心,文艺理论研究揭示了挪用的双重含义:挪用作为底层的抗争工具的政治性[21](P.114)[22];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适应与生成的途径[23](P.1-5)[24](P.2-13)。

社会科学中对挪用的研究目前还散落在各处,以中文学术研究为例,学者们多以"依"[25]"借用"[26]、"借口"[27]、"挪用"[28][29]来指代互动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并重点针对集体事件与社会运动中底层的反抗型挪用[25][26]、国家治理中社会精英作为中间人沟通国家与底层形成的共识型挪用[28][29]进行研究。同时,一些学者还针对中间人的挪用行为,对共识的虚假性进行了批判反思[27][30]。虽无法穷尽挪用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但受惠于文艺理论[31](P.1-31),结合互动现实,笔者认为梳理出分析挪用的框架还是可能的,即以主体、客体、目标观众及策略目的形成的分析挪用的四段论。这其中,目标观众对于主体为中间人/掮客(Middleman/Broker)的挪用分析至关重要:中间人的行动一般涉及"上下"双方,而面向不同的目标观众,中间人一般会挪用不同的客体,乃至形成不同的策略目的。至此,基于本节提出的挪用四段论框架,下文首先对农场与P村的概况及社会责任的实践进行介绍,而后利用该框架对中国企业与非洲社区围绕一个客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挪用进行分析,最后进行总结与讨论。

三、农场与P村:空间共识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一)空间共识:P村"内"的农场

坦桑尼亚某中国农场(下文简称农场)坐落于坦桑尼亚中部的M省,占地约5900公顷。该农场的历史可追溯至英国在坦桑尼亚的殖民时期。1964年坦桑尼亚独立建国后,农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7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乌贾马(Ujamaa)运动的兴起,农场被收归国有。至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银行的主导下,坦桑尼亚开展结构调整计划及私有化改革,这时农场被卖给了坦私人所有。到1999年,中国某国企通过收购,获得了属于同一私人所有的两块农场的土地使用权,合并形成了现在的农场。随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该国企被纳入了国有某农业集团,坦桑尼亚农场也成为了该集团项下的某公司的海外企业之一。

由于行业特点,农场在坦桑尼亚不但开展了种植活动,而且还在当地建立了原材料加工厂。R乡的P村就是农场加工厂落户的村落。历史上P村的形成同农场紧密相关,据村内老人M介绍,1937年在农场建立前,P村就开始有人定居,随后农场建立迁移了很多坦桑尼亚其他部落的人来此定居,成为农场的工人。同时,为了解决工人住宿,农场为工人建立了定居点,这个定居点也即是后来称作"Campuni"④的C分村。但由于职工营地并不属于个人所有,后来有些工人便搬出农场营地,在靠近加工厂的地方建造自己的房屋,即形成了P村现在的核心区域M分村,而后随着乌贾马运动的兴起,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开展了村落化[32](P.146-153)与农村发展运动[33]。在这一运动中,P村正式建立了村级行政政权并在国家支持下建立起了村小学,M分村、离小学不远的S分村以及周边的T分村被统一整合都归属P村管辖。后来,到90年代私有化改革后,原属于国家管理的C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分村被划拨到 P 村,至此下属 4 个分村的 P 村行政区划确定了下来。

在 P 村人对农场的空间认知中,村民普遍认为农场是在 P 村"内"的。一个例证是悬挂于村办公室内的村民手绘 P 村地图。据该图显示(见图 1),以红线标注的方形区域为 P 村的边界,而这一区域不但包含农场的加工厂,还囊括了农场的部分种植田。在 P 村人的视角中,农场与 P 村的空间关系呈现出"村内农场"的格局。

图 1 P 村地图

图片来源:P 村村委会提供,田野笔记,2014 年 8 月 13 日。

但同时,从正式的土地确权视角来看,图 1 中的 P 村地界中,大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农场所有,而土地的所有权则归属于 P 村上级 K 县地方政府,在土地法律关系中,P 村实际和农场无涉。在一张农场管理人员出示的标注农场拥有土地证的正式测绘图(见图 2)中,P 村位于农场与另一 K 农场之间的狭长地区,是农场"旁"的一个村子。另外,农场的农田边界也跨越了一村一界,仅在 R 乡就涉及 P 村在内的 4 个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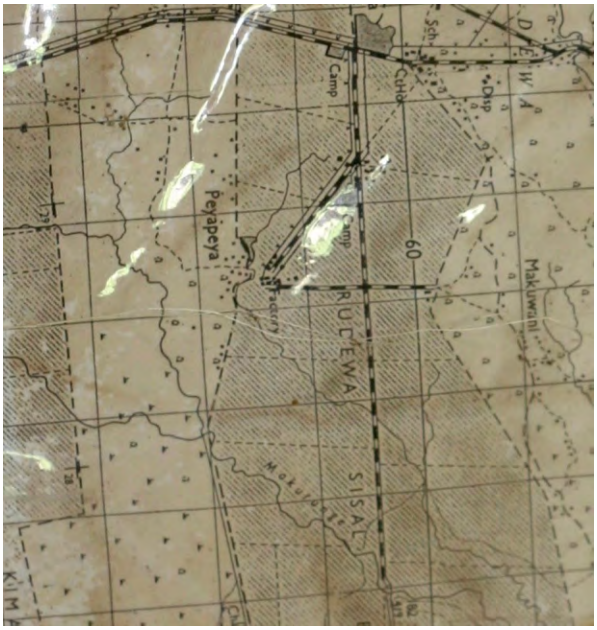

图 2 农场测绘图

图片来源:农场员工 Mi 提供,田野笔记,2013 年 3 月 5 日。

尽管如此,不同于法律确权显示的正式边界,以中方管理人员、坦桑尼亚管理人员为核心的农场人和当地的 P 村人都认同"在村内的农场"这种空间关系,在农场工作的坦桑尼亚籍的高管是这样表述 P 村与农场的空间共识的:

"P 村是同我们最近的村落,我们的工厂建设在这里,我们的职工住在这里。我们的土地是 P 村的土地。"(Mi,农场坦桑尼亚籍财务总监,田野笔记,2014 年 10 月 9 日)

同时,农场的中国高管也认可这种空间关系,G 作为中方的农场经理也曾直言"我们的工厂在 P 村,所以我们要同 P 村搞好关系"。如 G 所言,正是这种"村内农场"的空间共识构成了农场针对 P 村实施一系列社会责任实践的基础。

(二)农场的社会责任实践

首先,农场承担了 P 村部分医疗服务的供给。C 分村内建立着一个专供农场职工使用的医院,同时这个医院还有偿向 P 村的其他村民提供医疗服务。除此之外,2015 年农场还与中国驻坦桑尼亚外交部、中国援非医疗队等合作,在医院中开展过针对 P 村的药物与蚊帐的免费发放及义诊活动。农场的中方管理人员这样评价了这些合作:

"还是要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外交部有个活动,打算在 P 村以及 Mvimi 搞两个试点,发放药品以及蚊帐,我们征求了相关意见,修改了计划,最后执行结果很好,并且还降低了活动成本,原先的 1 万多美金,变成了 7000 多美金。还有和医疗队合作给村民看病,结果医疗队义诊结束后,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看上,还得继续看。"(G,农场经理,田野笔记,2016 年 5 月 18 日)

其次,通过农场引介 P 村成为了一项中国援助的项目开展地。该项目不但为 P 村新建了村办公室、修整了村内公共道路、修建了新的饮水管道,而且还针对村民推广了中国小农式的玉米生产经验与技术。在该项目中,农场不但作为引介方,为 P 村带来了这个项目,而且还作为具体的在地实施人,负责并协调了诸多项目活动。例如,饮水管道的水源即是农场所有的取水井;村内的公共道路也同样是农场利用"关系",联系其他在坦的中国建筑企业为 P 村修整。项目开展后,由于推广的技术取得了增产增收的巨大效果,项目成为了中坦民间农业合作减贫的典范,随之 P 村也变得有名。时任 P 村村主席的 A 女士是这样评价项目给 P 村带来的变化:

"名声,因为项目,P 村在全国知名,接受了许多领导人的访问。"(A,P 村村主席,访谈笔记,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14 年 8 月 8 日)

最后,农场还将种植田内的空地出租给了当地以放牧为生的马赛人,同时将马赛人缴纳的放牧费全部返还给了 P 村。实际上,马赛人放牧的地区并非仅仅涉及 P 村,而且还涉及 R 乡的其他几个村子,但除了 P 村,其他村落并没有获得这笔款项。总之,在所有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中,P 村是农场优先考虑的相关人,而这种相关性主要源于农场同 P 村达成的"在村内"的空间共识。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中非"挪用"

(一)面向国家的企业"挪用":以"小"撬"大"的策略

对农场而言,国企的性质注定了国家的关注及支持对农场的存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对农场人,由于投资额度小,占地面积小,坦桑尼亚农场并没有受到重视,在访谈中农场的中方管理人员这样表述道:

"国家针对国企的或者企业应该进行专门的支持,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农场目前是经营的最好的,是最具有优势的。国家予以支持,找一个点把它做好了…但是我们的发展往往重视规模,小的看不上……基金[农场的中国国有投资方]强调的是当年投资,当年营利,还有的大规模项目,比如莫桑比克的水稻项目,那个是总统答应给了 2 万公顷土地,包括大部分官员不知道多少多少公顷是什么概念。比如说 K 公司在坦桑尼亚所为[拿到了大规模土地却没有经营],并没有起到什么好的效果,反倒是西方人觉得是中国人贪地拿地的资本掠夺。其实不然,比如像农场这样的小规模,善开发的公司,让外界真正觉得你是在运转这片土地,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效应。"(G,农场经理,田野笔记,2013 年 3 月 24 日)

因此,小而有特色是农场日常经营的一个策略,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就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太"小"的规模尴尬通过企业"挪用"社会责任获得了弥补。2015 年,农场作为中国在坦桑尼亚投资的典型被邀请前去首都达市开会,会后返回农场的参会经理这样向农场的中国员工介绍了会议情况:

"8 月 15 号,M 来坦桑尼亚座谈央企的情况。我们是 2 月份接到的通知。[去的公司]一共有 ZSY、ZTJG、ZGZT、ZHJ、ZJ、ZSD 和我们农场。他们都是干工程,以投资为主的就我们这一家,同他们相比,我们项目最小,才 600 万[美元]。但是我们的亮点是质量前茅,可以理解为全世界最好的,职工医院的医疗救助[做得好]。领导觉得汇报很有价值,值得研究"(G,农场经理,田野笔记,2014 年 8 月 30 日)

总之,政策话语中对海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倡导,给予了企业利用社会责任实践,撬动国家关注的机会。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个场域中被农场"挪用",面向国家构建起一种负责、有道德的好企业形象,从而克服了"小而不见"的尴尬,成为了一种以"小"撬"大",争取国家关注的企业策略。

(二)面向 P 村的企业"挪用":建立"关系"的策略

中方经理 G 在笔者询问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时,这样回答道"因为我们的工厂在 P 村,我们需要搞好同 P 村的关系"。"关系"一词,在我国具有情感、人情、面子、回报等丰富的行为内涵[34],其建立及运作基础是"人情交换",这被杨联陞总结为"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报'"[35](P.65),同不求回报的"君子之德"相区分,成为了中国世俗社会建立的基础。同时,"报"也常与人类学礼物理论中的互惠相联[36]。人类学对礼物的探讨大多关注礼物的流动同社会关系的建立,如莫斯对礼物分析的三个环节:给予—接受—回馈的关注即是对礼物循环能否建立人与人的链接进而建立社会的关切[37](P.5)。而在"关系"的生产过程中,报的建立至关重要,这种机制是建立"给予—接受—回馈"闭合圈的关键,同时也构成了闭合圈中给予的动因,从而使得该闭合圈自主循环。但对于本文而言,农场的"关系"有一定特殊性:首先农场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一种对于 P 村的"报",反倒是一种给予社区的"恩",中方的经理人认为企业办社会组织是境外国企不得不为之事,并对此如此表述:

"国内的农场是一种社会组织,比如垦区的农场是社会组织,原来是企业办社会,现在企业同社会职能剥离,企业成为了市场主体,办医院应当由社会办。但是国外的情况不同,办医院,判断的标准要区别。效益角度考虑农场没有义务办,但是农场不解决就医问题,企业对当地的影响不好。我们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境外企业追求效益的平衡,不能赔钱,但能够提高社会效益,应使其最大化。办医院,办学校不能成为企业生存的负担,但是不办又会遇到现实问题。"(H,农场北京总公司财务总监,2013 年 3 月 10 日)

因此,笔者认为这与国企改革中福利观念的"包下来"到"甩出去"的转变有关,中国人在坦桑尼亚办社会组织并非出于企业占用了村庄土地而产生的"报"行为,或者说空间的共识并没有生产出义务观,而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对底层民生的"恩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情”,而这种恩情对受恩者,尤其是 P 村具有“报”的期待。在农场面向 P 村的挪用中,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首先成为农场给予 P 村的“恩”,进而隐含着“报”的期待,最终追求的是企业同村落建立起社会联系的策略目的。农场对于“报”的期许是多方面的,有对农场中国人的殷勤、感恩这种情感工作的预期,也有要求村落在解决罢工、解决放火、维护稳定的劳资关系等一系列的实践期许。在这轮面向 P 村中的挪用中,以“报”为核心的“关系”的建立是企业“挪用”社会责任的策略目的所在。

(三) 面向企业的 P 村“挪用”: 建立单向依附的策略

翟学伟指出“报是封闭式的交换结构,参与者和交换者无选择性地被卷入到报的运作过程中,这种结构不给参与者退出的权利,进而导致报形成一种义务,并迫使中国人在交换过程中常会有不得已为之的心理压力”[38]。但是陷入到中国农场“搞好关系”策略中的坦桑尼亚 P 村却没有这种“报”的压力。一次农场经理人对笔者说道:

“比如我们中国人帮别人通常会觉得高人一等的,被帮了也是要报恩的。但是坦桑尼亚人没有,他们觉得你是上帝派来的,当然他们也有感恩但是方式很不相同。”(G,农场经理,田野笔记,2013 年 3 月 7 日)

同样,在笔者的田野中,也发现了这种只强调“给”不强调“报”的“坦桑精神”。2014 年,坦桑尼亚总统推进中学实验室的建设,在总统令中要求全体坦桑尼亚人以村为单位对此进行钱、物(主要涉及建筑材料)的捐赠。因此 P 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来讨论怎样收集这部分款项。在村内大会上,有人向村委会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不找中国农场要钱?”进而有了如下对话:

“我要提醒大会,有一本书是 Nchimbi 写的,这本书说每个投资者有义务帮助周边社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必须帮助社区内的居民,围绕在投资者周围的社会,甚至是生病的人比如 HIV。所以中国农场必须对此有些贡献。”(Maj,P 村 C 分村主席,田野笔记,2014 年 9 月 10 日)

村民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挪用实际上只强调“给”,不关切“报”。这种情形农场的中国人很为熟悉,他们在交谈中常常指责坦桑尼亚人“没人情,是填不满的洞”这类言论。实际上,有研究指出坦桑尼亚的本土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一种慈善观念,其动因是一种泛非洲的 Ubuntu 精神[39]。Ubuntu 作为南部班图语汇,其内涵包括人性、乐于分享,集体与仁等含义⑤。Kamwangamalu 指出 Ubuntu 是一个泛非洲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是与西方的个体独立所不同的“相互依附”(Ubuntu as Interdependence) 的集体主体性[40]。这一论点也得到了诸多其他国别研究的支持,如 Tambulasi 与 Kayuni 对马拉维的研究[41] 及 Kresse 对斯瓦西里语海岸(部分肯尼亚及坦桑尼亚地区)的研究[42](P. 246 - 265)。其中 Kresse 的研究表明,斯瓦西里语海岸地区存在着与此相似的人文理念即“Utu”精神。同西方的“我思故我在”的个体主体性不同,Utu 中强调集体对自我构建的重要意义: 即“我因我们而在”(I am because we are)[42](P. 262)。这也与 Ferguson 在“依附宣言”一文中对非洲主动建立依附关系的判断相符[43]。

而强调“给予”,不强调“回报”的根源实际上正是来自于这种 Utu/Ubuntu 精神,可以说,对中国农场与 P 村而言,挪用的目的一个是为了建立“报”,另一个则是建立“给”,其差异正是源于中国的关系文化中“报”的理念与 Utu 精神中“乐于分享”相冲突,这种单向的依附观也可在吴迪的“不对称”殷勤的论断中发现相似之处[44]。

总之,寻求给予、建立依附成为了 P 村面向农场挪用社会责任的目的,也正是这种单向依附的 Utu 精神与关系中“报”的不同,构成了企业与 P 村互动中最重要的文化差异,成为了中国人与坦桑尼亚人互不理解的断裂点。

(四) 面向 P 村的 R 乡“挪用”: 平衡资源分配的策略

在所有的同农场具有空间联系的村落中,P 村俨然是中心。这种中心感主要来自于农场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 P 村优先性,尤其是农场引介的减贫项目及马赛人的放牧款分配这两件事情,在彰显出 P 村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也给 P 村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在 2013 年由某国际援助机构主导的水利建设项目中,R 乡在选取项目点中就没有考虑到 P 村,但同时紧邻 P 村的 R 乡政府所在的 B 村就成为了项目点。关于此,时任 P 村的村主席 A 是这样表达的:

“那些人憎恨我们和中国农场的关系,因为农场我们得到了许多好处,比如中国人的项目。他们不想让 P 村获得这个项目,所以这次他们不让我们参加 Iwash 的项目”(A,P 村村主席,田野笔记,2014 年 8 月 8 日)

Iwash 项目资源分配,并没有考虑到 P 村,在针对这件事的质疑中,乡长 L 面对我这个中国人,极力否认“因为 P 村和中国人的关系,所以不考虑 P 村成为新的援助项目实施地”的原因猜想,他举例说: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比如我有5个小鸡,我没有必要饿着这个而优先喂养另外4个,我们要的是公平。"(L,R乡乡长,田野笔记,2014年9月30日)

实际上,不难发现正是保持公平成为了R乡面临新的项目资源分配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在这一轮的挪用中,企业社会责任被R乡挪用,成为了平衡乡内资源分配的策略,间接导致了P村在新项目分配中的落选。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展示出的挪用企业社会责任的中非遭遇,是各个主体依靠挪用形成策略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于不同的互动场景中存在不同的策略性含义:不仅是企业撬动国家关注、搞好与本地村落关系的策略,同时也是本地社区建立依附、平衡外来资源分配的策略。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在现实中是一个被不同行动者不断挪用,建构生成的动态多面体。但是本文的挪用始终未建立共识形成共识型挪用,被挪用的客体—企业社会责任—仍旧无法跨域中国的"报"与非洲的"Utu/Ubuntu"精神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提醒了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在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搞好同当地的关系时,需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本土化思考,只有先搞清楚本地人想什么,怎么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才能有效地利用这一工具建立有道德的企业形象、实现投资运营的可持续性。对国家而言,本文研究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在跨文化背景中所具有的多样化含义,因此在推动海外企业对当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有必要提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自身的文化渊源中寻求解释并加以利用,而非单纯套用西方话语。

另外,对于跨文化背景下的互动策略而言,"挪用"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价值在于凸显中非遭遇过程中的"西方在场"。与"挪用"类似,发展人类学在针对西方发展遭遇非洲或者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研究中,提出了"转译"(Translation)作为核心的互动分析框架[45](P.15-17),揭示了发展经纪人作为桥梁将内外相异的知识相互翻译的能动性[46](P.75-100)。笔者认为翻译式互动概念对于"西方—非西方"的二元遭遇模式的解释是恰当的,但对于中非遭遇而言,纯粹的"中非"二元遭遇并不存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都无法抛开西方知识、概念、话语所代表的现代性而自说自话,因此现实的中非遭遇情景总是西方在场下的三方遭遇,也因此挪用这一分析概念与框架才更显其张力。正如文中所分析的多主体互动一样,挪用的客体固然是西方的,但是通过挪用,各类主体都在能动地解构西方话语并建构自己的策略,这是"挪用"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对"转译"揭示的二元遭遇之缺陷的补充,也反应出中国推动下的新全球化图景中多元互动的新特点。

注释:

①参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通知》、《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管理指引》、《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等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表述。

②参见新华字典在线版对挪用的解释:http://xh.5156edu.com/html5/333796.html.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4日。

③参见英文词根词典在线版对词根的解释:http://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appropriatus.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4日。

④Campuni/Kampuni为当地斯瓦西里语,中文含义为营地周围,其中Camp属于斯语中的外来词,原为英语的营地之意。

⑤参见新编斯汉词典在线版对Ubuntu一词的解释:http://siwaxili.com/Ubuntu,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8日。

参考文献:

[1] McBride, Edward. *A Ravenous Dragon: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Quest for Resources* [N]. Economist, 2008-03-13.

[2] Kagan, Robert. *League of Dictators?* [N]. Washington Post, 2006-04-30.

[3] Leigh D, Pallister D. *Revealed: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N]. The Guardian, 2005-06-01.

[4] Blowfield M, Frynas J G. *Editorial Setting New Agenda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5(3).

[5] Shamir R. *Between Self-Regulation and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On the Contested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Law & Society Review, 2004(4).

[6] Pegg, 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ource Extraction: Are Chinese Oil Companies Different?* [J]. Resources Policy, 2012(7).

[7] Pegg S. *World Leaders and Bottom Feeders: Divergent Strategies Towar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ource Extraction* [A]// May, C. (Ed.), *Global Corporate Power* [M].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8] 沈铭辉,张中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案例分析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2).

[9] 张炳雷.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困境分析:一个社会责任的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1(4).

[10] 李志永.企业公共外交的价值、路径与限度——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2).

[11] 田广,周大鸣.中国需要工商人类学[J].民族论坛,2013(6).

[12] 陈刚.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J].民族研究,2011(1).

[13] 周大鸣.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14] JordanA T.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Its U-*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nique Contribu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2010(1).

[15] 田广,周大鸣. 工商人类学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16] 田广,刘拉雅,刘瑜. 汕头老字号餐饮品牌发展轨迹与问题——基于一项工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 [J]. 民族论坛,2015(9).

[17] 田广,邵欢. 跨文化与跨民族市场营销的人类学思考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4(2).

[18] 田广,刘瑜,汪一帆. 质性研究与管理学科建设: 基于工商人类学的思考 [J]. 管理学报,2015(1).

[19] Hutcheon L.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 - Century Art Forms* [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20] Dollimore J, Sinfield A.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 [美] 约翰·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 [M]. 杨全强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2] 程军. 论戏仿的挪用策略 [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23] Young J O.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 [M].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10.

[24] 陈芳. "莎戏剧": 跨文化改变与演绎 [M].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2012.

[25] 李连江,欧博文.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 [J]. 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 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26] 黎相宜.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J]. 社会,2009(6).

[27] 保继刚,李郇. "借口": 中国城市资本高度集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J]. 人文地理,2012(4).

[28] 梁永佳. 制造共同命运: 以"白族"族称的协商座谈会为例 [J]. 开放时代,2012(11).

[29] 张兆和.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

[30] 梁永佳.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J]. 社会,2015(1).

[31] Hutcheon L. *A Theory of Adapt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32] Hydén G. *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 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3] Osafo - Kwaako P. *Long - Run Effects of Villagization In Tanzania* [A] //NEUDC Conference held at Yale University [C]. 2011.

[34] 边燕杰,张磊. 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 [J]. 人文杂志,2013(1).

[35] [美] 杨联陞.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M]. 段昌国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36] 李荣荣. 作为礼物的现代公益——由某公益组织的乡土实践引起的思考 [J]. 社会学研究,2015(4).

[37] [法] 马塞尔·莫斯. 礼物: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M]. 汲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8] 翟学伟. 报的运作方位 [J]. 社会学研究,2007(1).

[39] Mader K.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anzania: An Overview* [EB/OL]. https://csroverviewtanzania.files.wordpress.com/2012/08/csr - overview - tanzania3.pdf 2012 - 08.

[40] Kamwangamalu N M. *Ubuntu in South Africa: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o A Pan - African Concept* [J]. Critical arts, 1999(2).

[41] Tambulasi R, Kayuni H. *Can African Feet Divorce Western Shoes? The Case of 'Ubuntu' and Democratic Good Governance in Malawi'* [J]. Nordic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005(2).

[42] Kresse K. *"African Humanism" and a Case Study from the Swahili Coast* [A] // Dierksmeier, Claus, et al., (Eds.), *Humanistic Eth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ty* [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1.

[43] Ferguson J. *Declarations of Dependence: Labour, Personhood, and Welfare in Southern Africa*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13(2).

[44] 吴迪. 依附与非匀称性殷勤——中国、赞比亚的领导方式与上下级关系比较 [J]. 开放时代,2016(4).

[45] Mosse D, Lewis 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brokerage and translation in development* [A] // Lewis D, Mosse D. (Eds.),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The ethnography of aid and agencies* [M]. Bloomfield, CT: Kumarian Press, 2006.

[46] LeMeur P Y. *Governing Land, Translating Rights* [A] // Lewis D., Mosse D. (Eds.),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The Ethnography of Aid and Agencies* [M]. Bloomfield, CT: Kumarian Press, 2006.

收稿日期 2017 - 01 - 18 **责任编辑** 王启涛 吴定勇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